

李志永◎著

自主性外交理论：
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

The State Autonomy Diplomacy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Era of Internal-External Interaction

戴长征 主编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志永◎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自主性外交理论：
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

The State Autonomy Diplomacy Theory: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in the Era of Internal-External Interaction

戴长征 主编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主性外交理论：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与外交战略 / 李志永著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10

(贸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戴长征主编)

ISBN 978 - 7 - 5161 - 8224 - 6

I. ①自… II. ①李… III. ①外交—研究—中国 IV. ①D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9587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赵 丽
责任校对 邓雨婷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95 千字
定 价 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贺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编委会

主 编 戴长征

编委会成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宏禹	王 波	王晓梅	王海滨
石贤泽	冯 峰	乔 旋	李志永
张孝芳	李航敏	张萌萌	赵鸿燕
徐 松	董青岭	熊光清	熊李力
霍伟岸	戴长征	檀有志	

贺大国关学术论丛:中国与世界

总序

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丛林中，国际关系学科，乃至其源头政治学学科都成为魅力日益彰显，价值被普遍认可的“显学”。在中国，这两个学科在经过长期曲折发展后，正在成为一片茂密的知识森林，一道亮丽的学术风景带，既让无数学人沉迷其中流连忘返，也为中国的进步和世界的发展贡献着思想上的源头活水。

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之所以有着越来越重要的学科和学术地位，主要在于其学科的外在要求和内在规定。就其外在要求来说，无论人类历史的昨天、今天和可预见的明天的状况如何，总体来说它一直处于“政治社会”之中。政治环境、政治关系、政治生态构成人类社会最关键的活动的活动基础，活动于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的政治行为体，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主体。当然，这不是说经济、文化，乃至军事这些社会构成部分、社会关系以及活动于其中的行为体就不重要，相反，它们非常重要，并且在某些特定的时期，甚至比政治更加重要。但是，政治作为人类组成社会进行有目的地改造自然和发展自身的主轴和关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人们当然还会想起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著名论断，但是，不应忘记的是，马克思所强调的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要通过一系列中介一系列变量一系列过程才能实现的，并且在这一实现过程中，政治这一上层建筑从来就不是作为外在于经济基础并被决定的力量而存在，而是持续参与其中，与经济基础不断互动、不断交换能量、不断更新自我，以与经济相互决定的方式而存在的。因此，作为处于人类社会活动主轴和关键地位的政治，无论其现象或本质如何，必然成为人们最重要的认识对象，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为我们提供了

基本的认识工具和观察形式。

但是问题在于,就当代国际关系而言,战后70年的变化发展,使其具有了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的内容和实质。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力量对比、地缘政治关系发展到今天,呈现出异常复杂的面貌,也不断为国际关系学科提出有待认识和解决的新命题、新课题。任何既有的理论逻辑和解释框架,对今天的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来说,运用起来都难免存在捉襟见肘的尴尬。原因在于,全球范围的政治关系和政治生活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某种整合的“理论想象”和“知识框定”。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预测战争与和平、安全与稳定这样的“高”政治,又可以解释货币战争、气候变化、能源危机这样的“低”政治。也不存在一种理论,既可以回答全球化(globalization)带来的挑战和问题,又可以回答区域化(regionalization)和地方化(localization)这些反向运动所带来的困惑和焦虑。对于国际关系学科来说,似乎面临着某种两难悖论:如果人们试图提供一种整合性理论解释,就难免与实际碰撞后遭遇漏洞百出,不能自圆其说;如果人们试图从实际问题出发,提供工具性回答,就难免牺牲理论的整全而遭遇知识和认识的碎片化局面。

对于政治学而言,挑战似乎比国际关系学科还要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人类一直渴望找到或建立能够保障基本安全和生活秩序的联合形式(共同体),这些形式或是城邦国家、或是王朝、或是城市共和国、或是帝国,直到近现代的民族国家。对于近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人们曾寄予深切厚望,认为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解决政治难题的最高形式,以至不断歌颂之、赞美之、批判之、挑剔之,目的都在于改造之、完善之。但是,事实却是国家导致的问题可能和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强大的国家,给予人民的压迫,可能一点也不比弱小国家少;弱小的国家,遭遇的外部欺凌和内在困局,使其国之不国。哪里才有“理想国”,哪个国家才是现实存在着的“理想国”?那么,对国家的超越可能是一种选择,但这样的超越,又给政治学带来极大的困惑。欧盟是一种超越形式,但希腊的危机和欧盟内部的治理难题,使得人们对这一超国家形式心生畏惧。至于“伊凡特—伊斯兰国”,与其说它是对国家的超越,还不如说是对国家的僭越,它只是一种恶的“集合”形式。不宁唯是,政治学不但在国家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上少有共同之处,在诸如正义、民主、平等这些根本价值问题上,更是充满歧见。作为现代国家基石的民主,曾给人们带来无上的

向往，无穷的想象。但民主在实践中正在被杀死，在理论中正在被任意扭曲肢解。一些号称民主的国家正在干着最不民主的事情；一些朝着民主方向前进的国家，却发现自己被困在了一片泥泞沼泽之地。这是理论的现实，也是现实的理论。

那么，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还能做什么？回答是，这两个学科不可能拔起自己的头发，实现自我脱离。相反，问题产生的地方，就是学科性之所生，命之所系的地方。换句话说，只有将学科的根本深深扎入现实，并延伸到历史深处，才能获得学科生命；也只有不断将根本加以拓展延伸，才能丰富壮大自己的学科生命。也因此，学科的内在规定才最终与学科的外部要求结合了起来。对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而言，其学科内在的规定就是要使已形成的一整套理论适应客观的现实性要求，不断自我补充、自我修正、自我完善，实现学科工具性目的和现实价值性目的的进一步结合。因此而言，在变化急速、纷纭复杂的现实政治面前，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无能为力，正是其能力所生的地方，这就像矛和盾的关系一样。是故，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的内在规定，其一是说，这两个学科已经有了区别于其他学科并经过长期锻造而来的工具，其二是说，这样的工具，还不能满足人们对它削铁如泥，披荆斩棘能力的期待。但是，这样的能力却不是等待中能够获得的，具体而言，无论是国际关系学科还是政治学学科，都应该在两个面向上加强努力。一方面，应该聚焦具体的问题领域，就是学术研究要做好“立地”的工作。立地的研究看似琐碎、细致、不统一、不连续，甚至给人以“碎片”的感觉，但任何具体研究不可能不贯穿着认识论和方法论。经年累月的“立地”的量的积累，不经意间恰会带来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突破，这正如蚕蛹的破茧而出，新竹的拔地而生。在学术思想史上，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另一方面，不能放弃哲学的思考和理论的批判，换句话说，要做好“顶天”的工作。“顶天”的研究看似玄妙，莫测高深，甚至虚无缥缈，但任何顶天的研究，无不充满对历史和现实存在的深切关照。顶天的意义在于，跳出思维的窠臼，打破具体问题的藩篱，指出出路和方向；顶天的意义还在于，吐故纳新、推陈出新，不断地在批判中扬弃，实现理论和思想的超越。在儒家学说史上，从原始儒家到阳明心学的嬗变；在政治学说史上，从城邦政治学到马基雅维利乃至摩根索的跃进，无不说明这一道理。或许，这样的突破未必会在一批人一

代人中实现,甚至经过几批人几代人也未必见效,但学术探索的价值也正在于此。这恰如对一口井的深挖,不到第一滴清泉喷涌而出的当口,就难言成功的滋味。但挖井的意义绝不仅仅在此,挖井的过程才具有本质的意义。

在中国国际关系学科乃至政治学学科的发展进程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是一个后来者。但后来者先天的后发优势,在这个年轻的学院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2006年建院至今不满10年时间,贸大国际关系学院从国内外名校和科研院所撷取到近30名学术精英。依靠这批年轻的力量,贸大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学学科不但实现了零的突破,而且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贸大国际关系学院现在拥有两个层次,六种类型的学生,即本科生、本科生留学生、本科生留学生英文项目,研究生、研究生留学生、研究生留学生英文项目,涵盖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绝大多数专业,近400名学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发展,大大有赖于“学术强院”战略的实施。事实证明,科研和学术永远是学科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量和不竭源泉,这在贸大国际关系学院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别的不说,就纵向的国家课题和省部课题而言,在不到10年时间里,学院已结项和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就达到了14项,教育部和北京市社科基金近30项。学院教师累计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了近500篇论文,其中不乏在国内外顶级期刊的发表。

正是基于对科研和学术重要性的认识,学院决定集中力量以另外一种形式即学术丛书的形式展示已有的学术积累。这里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特别要感谢赵丽编辑的耐心和艰苦努力,使得丛书的出版成为可能。即将出版的和纳入丛书出版计划的学术著作,有的是在年轻学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有的是学院教师的新著,涉及的研究领域和主题多种多样,研究取向和方法各异。但是,这些论著都有着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勇于迎接学术挑战,尽最大努力回答国际关系学科和政治学学科在政治现实方面遭遇的新课题、新命题。丛书中有的尝试着“立地”,有的尝试着“顶天”,立地者有时难免看起来“支离”,顶天者有时难免看起来“玄虚”,甚至存在着相当的“遗漏的不满”和“选择的遗憾”。但这种“支离”和“遗漏的不满”,以及“玄虚”和“选择的遗憾”恰是学术进路的必需。学术是一个永不停歇的进程,它的意义不在于一本书或一篇论文的自足和圆满,而在于无数片段的连续所形成的动态

图景。通过这一连续的动态图景，对现实理论和理论的现实的进一步关照和沉思，才会进入新的层次和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丛书作者们的努力有着丰富的价值，也有着令人感动的分量。

是为序。

戴长征

2015年8月于北京惠园

自序

构建综合理论的萌动源于我学习国际政治学以来一直面临的“身份困惑”。在我2003年入读人大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中国国关学界正处于对西方理论大加引进的阶段。对那些对理论感兴趣的初学者来说，选择一个理论流派作为自己的理论归属或研究对象是学界流行的现象。而在我对三大流派的初步学习过程中，似乎并没有被任何一个理论所深深吸引。于是我刻意在2003—2004年期间先后系统地阅读了汉斯·摩根索、肯尼斯·华尔兹、约瑟夫·奈、罗伯特·基欧汉、亚历山大·温特的经典代表作，但仍然没有成为任何一个理论流派的追逐者。当时的我深感“身份困惑”。与此同时，通过阅读王逸舟相关著述，“学会在不同理论岛之间穿行”的总结在让我深以为然的的同时又颇感不满意。在2004年暑假，或许是受当时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回归实践的讨论的影响，我突然觉得，国际关系何尝不是典型的人类实践呢？为此，“把实践引入国际政治，探索国际政治的实践理论以超越三大理论”成为我当时朦胧、激动的想法，并为此阅读了有关“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文章或论著，但深感迷茫进而放弃。在2005年毕业进而任性地选择工作而不是读博之后，我的学术之路似乎终结。或许是毕业做老师而没有远离校园的原因，继续求学进而从事研究逐渐成了我的人生目标。在2007年重新考入人大之后，中国外交成为我最为关注的领域。20世纪60年代“革命外交”曾是我选定的研究对象，但在对“革命外交”的探索中，我逐渐转向了外交决策的根源的探讨，进而关注到了国家—社会关系、“施动者—结构”问题、国家自主性等议题而舍弃了“革命外交”本身。也正是这一转向，我逐渐找到了攻克的目标，“如何从国家—社会关系角度探究一国外交政策的根源？”2010年5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答辩通过的博士毕业论文《国

家自主性视角下的外交政策分析——结构、模式与行为》正是从国际社会—国家—国内社会视角思考的结果。但当时并未试图构建任何理论。

尽管此论文曾经获得 2011 年中国人民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 2012 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但基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觉得有必要从理论构建角度对原论文进行诸多改造。

基于近几年国际国内客观形势的剧变以及对时代形势变化的主观判断，我试图从内外联动视角去深入分析各国外交政策的趋势与性质。在我看来，以“阿拉伯之春”为代表的底层革命运动和世界各国内部底层民众的不断觉醒，加上信息技术的推波助澜，尽管存在种种民粹主义的躁动因素和右翼的保守因素以及外部的鼓噪因素，但其寻求民主的主流仍是其中决定性因素，21 世纪正在开启人类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在全球化与民主化双重作用下，我们见证了国际国内因素在外交决策中同时增强的两个趋势。21 世纪是全球化时代，也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更是内政与外交频繁、密切互动的内外联动时代，内外联动正在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新常态。而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决定了，如何分析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行为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研究者的重要课题。而既有侧重国际体系因素的结构理论和侧重国内因素的外交政策理论均已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现象，我深感我们需要新的理论工具去观察和分析这一现象及其本质。这构成了修改原论文的最主要理论诉求。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以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姿态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和平外交，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及其和平崛起需要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支撑与说明。这构成了修改原论文的最主要现实背景。

正是长期以来对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与中国外交的兴趣，促使我试图构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凸显外交行为一般性规律的外交理论。在我看来，经过多年的理论论战和实践检验，国际关系三大主流理论显然只是“片面的真理”，如何建构一个能够超越这三大理论的综合分析范式虽然一直是国际关系学界的追求，却一直没有出现。正是在此背景下，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分析折中主义”一度成为主流理论家的主要选择，国际政治实践理论则成为诸多具有后现代、解构主义倾向的理论家的新探索；而在不满足于一味应用西方理论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中国学者

或者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或者通过焕发传统文化的活力，提出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的进化理论”“道义现实主义”“天下主义”“国际共生论”等综合理论形式。尽管这些理论努力各有洞见与理据，但鉴于种种原因，迄今为止，各种综合理论努力仍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相反，冷战结束以来，伴随全球治理的兴起，各种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越发受到学界重视并取得了不少成果。针对这种大理论贫乏局面，一些人甚至宣称“理论死了”，国际关系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虽然“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失为在没有找到理论突破口的明智选择，但对理论研究采取鸵鸟态度显然又是不明智的短视选择，因为没有理论的指引，人类很难找到正确的方向。而对正试图开辟和平崛起伟业、避免大国政治悲剧的中国来说，没有源于自身又包容世界的理论，必将难于达至复兴与和平的彼岸。

面对内外联动的新常态和中国和平发展的新伟业，我在本书中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分析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政策及其行为？”试图达到的理论目的是尝试“构建一个分析内外联动时代外交行为的综合理论模式，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的综合”，试图达到的政策目的是“为统筹内外联动新时代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供理论指南，并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基于此，我借鉴哲学社会科学有关施动者—结构论战的智识成果和政治学的国家主义研究视角，以具有本体论地位的国家为中心尝试构建了“自主性外交理论”（state autonomy diplomacy theory, SAD）模式，试图在实现国际关系理论综合的同时，为中国和平发展提供理论性说明和政策启示。

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假设是，各国基于自主性的追求而与不同层面、不同属性、不同主体间的结构性因素的互联互动决定了各国外交行为。换言之，各国外交行为取决于国家与不同结构性因素互联互动的性质、过程与结果。如果说结构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是“权力分布决定国家行为”，新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假设是“制度分布决定国家行为”，结构建构主义的核心假设是“观念分布决定国家行为”，那么，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核心假设就是“自主性的分布决定国家行为”。基于这一核心假设，本书还对内外联动时代外交行为的基本性质、总体趋势与战略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案例检验，据此提出了观察、预测外交行为的十四个假设，最后本书还从自主性外交角度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转型提出了诸多

政策改进建议。

尽管理论思考是终身难以穷尽和完善的,自主性外交理论或许也存在诸多偏颇之处,但我仍然希望这一尚不完善的理论能够有所贡献。在我看来,以施动者—结构问题和国家主义视角切入外交政策分析及其理论构建,拓展了既有理论研究视野,实现了施动者理论与结构理论的综合,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为大理论的创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为中国学派的建设贡献了绵薄之力。自主性外交理论基于内政外交紧密互联互动的国际政治新常态,是理解内外联动时代外交行为的有益视角,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日益全球化、民主化的各国外交行为,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

当今中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积极参与者、关键塑造者和重要领导者,但尚未形成与之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其根源之一在于面对中国和平崛起这一历史性大事件,世界尤其是中国自身尚未形成自成体系的国际政治理论予以合理解释。2016年5月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战略还不十分明确,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学术原创能力还不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我看来,本书构建的自主性外交理论不仅基于中国外交的持续思考,而且也基于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概念范畴,这种源于中国又包容世界的理论范畴必将促进中国特色外交理论的发展,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理论支撑。与此同时,重视内外联动和自主性国家构建的自主性外交理论必将有利于中国改进国内社会治理质量、提升统筹内外两个大局和塑造全球治理的能力,进而有利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和平实现与世界和平的维护,从而成为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实践指南。

总之,本书在原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反复思考与推敲,不仅较大地调整了章节布局,新增了章节内容,而且修改了思考维度,转换了视角立意,拓展了主题范围,突出了理论构建的研究任务,彰显了理论应用的政策价值,虽然没有把原博士论文全盘推翻,但确实使得新书焕然

一新、迥然不同。当然，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一般性的综合理论乃笔者初衷，这一理论任务是否真的完成还需实践检验。因此，自主性外交理论仅是“一孔之见”，其中一定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笔者暂以此稿了却长期的思想萌动并受教于各位专家，并将尽力从善如流，希图日后不断提升改进。

李志永

2016年7月18日于贸大

目 录

导论 如何分析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	(1)
第一节 内外联动时代及其基本特征	(2)
第二节 “国家中心”现实主义的启示与不足	(8)
第三节 研究主题、研究任务与基本内容	(11)
第一章 外交政策分析:特征与价值	(16)
第一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兴起及其特征	(16)
第二节 外交政策分析与国际政治研究	(20)
第三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价值:大理论的切口	(21)
第二章 外交政策分析:模式与难题	(24)
第一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四大类型	(24)
第二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模式与难题	(29)
第三节 外交政策分析的综合努力	(47)
第三章 施动者—结构论战:借鉴与超越	(62)
第一节 社会科学中的施动者—结构论战:界定与争论	(62)
第二节 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结构问题:论战与出路	(67)
第三节 超越施动者—结构论战:“结构—认知—行为” 分析框架	(85)
第四章 外交行为的三维结构:国际与国内	(90)
第一节 结构的面向:权力、制度与观念	(91)
第二节 外交政策的国际结构	(96)

第三节	外交政策的国内结构	(100)
第四节	结构与行为	(108)
第五章	外交行为的施动者:国家及其自主性	(113)
第一节	国际关系中的施动者争论	(113)
第二节	国家及其自主性	(119)
第三节	内外联动时代的复合自主性	(129)
第六章	内外联动时代的外交: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构建	(135)
第一节	内外联动时代的国家目标与决策结构	(136)
第二节	内外联动时代与国家自主性的变化	(137)
第三节	自主性外交理论的构建与核心假设	(139)
第七章	自主性外交理论与外交行为趋势分析	(145)
第一节	国家能力与外交行为	(146)
第二节	国家实力与外交行为	(157)
第三节	合法性与外交行为	(167)
第八章	自主性外交理论与外交行为性质分析	(176)
第一节	权力与能力	(177)
第二节	自主性能力与进步外交	(181)
第三节	自主性地位与进步外交	(188)
第四节	中国国家自主性类型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	(193)
第五节	中国国家自主地位的演进与外交的进步	(200)
第九章	自主性外交理论与外交行为战略分析	(205)
第一节	全球化、内外联动与国家重构	(206)
第二节	“内外联动”的五大机制与战略	(210)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核心问题	(216)
第十章	自主性外交理论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223)
第一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势在必行	(223)

第二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内涵	(226)
第三节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策	(232)
结语 自主性外交理论:贡献与未来	(235)
第一节 主要结论	(235)
第二节 研究贡献	(238)
第三节 未来研究方向	(243)
参考文献	(246)
致 谢	(264)